

长江文艺出版社



过去的大学

钟叔河 朱纯 / 编

周鼎培	李钟湘	陈裕光	马约翰	冯友兰	林砺儒	张含英	茅以升	梁漱溟	沈尹默	张申府	罗家伦	蒋梦麟	蔡元培
朱仲华	祝文白	张锡祚	赵瑞蕪	苏润之	胡传揆	林语堂	柳无忌	梁实秋	茅盾	潘光旦	钱穆	胡适	梅贻琦

过去的大学

钟叔河 朱纯一 编



周鼎培	李钟湘	陈裕光	马约翰	冯友兰	林砺儒	张含英	茅以升	梁漱溟	沈尹默	张申府	罗家伦	蒋梦麟	蔡元培
朱仲华	祝文白	张锡祚	赵瑞蕤	苏润之	胡传揆	林语堂	柳无忌	梁实秋	茅盾	潘光旦	钱穆	胡适	梅贻琦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去的大学/钟叔河,朱纯 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12

ISBN 7-5354-3142-9

I. 过…

II. ①钟…②朱…

III. 高等学校-校史-中国

IV. G649.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324 号

策 划:刘硕良 吴 超

美术编辑:张双羽 张宝英

责任编辑:杨玉雪 刘坤怡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印张:22.875 插页:2

版次: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6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9.5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过去的大学》新序

钟叔河

“过去的大学”，是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当校长的北京大学，是梅贻琦当校长的清华大学，是罗家伦当校长的中央大学，是竺可桢当校长的浙江大学……

“过去的大学”，不是现代人在做总结，谈经验，作评论，而是当时的校长、当时的教师、当时的学生亲身经历的回忆。是茅盾讲他考大学，林语堂讲他读大学，端木蕻良讲他读中学，钱穆讲他从教小学到教大学的经过……

二十三年前我编了这本书，二十三年后还要人读这本书，还有出版家要印这本书，这就说明，“过去的大学”是有人愿意了解的，是有人不能忘怀的。

二十三年前，我还看不到蒋梦麟、梅贻琦他们的著作，还不大敢把林语堂、罗家伦他们的作品编到书里去。这就是“历史的局限”。这种局限，在有些过去的校长、过去的教师、过去的学生写回忆文章的时候，也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但是，我相信，这并不影响这些回忆文章的价值。因为尽管天时阴晴不定，气候冷暖无常，人们有时不能不穿风衣戴帽子，但冬天过后总是春天，地球总是照样地转，该肯定的终归会得到肯定，不会磨灭的终归不会磨灭。

此次重印，内容共为四十篇，其中二十三篇为一九八二年湖南教育出版社旧版所有，一十七篇为新增。这四十篇绝大部分都是记事记人纪实的回忆录，只有胡适、梅贻琦、陶行知三篇“务虚”。这三位都是现代教育史上重要的人物，这三篇又是现代教育史上重要的文献。要看“过去的大学”，我想是不能够不看这三位和这三篇的。

旧版序文，“历史的局限”尤其明显。因为是旧书重印，因为得尊重历

史,所以仍旧予以保存。《湘声报》向继东和《湖南日报》埃炼,还有湖南教育出版社符本清等三位朋友,帮助找来此次新增的材料,谨此致谢。

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于长沙念楼

[说明] 全书四十篇中,讲大学(包括专科)的三十六篇,占百分之九十,故将旧版书名《过去的学校》改为《过去的大学》了。

原 序

人都有自己的幼年、成年和老年。在幼年，大家都要进学校，到学校里学习知识，学习生活的本领和做人的道理。从小学到大学，起码得十五六年。大学毕业，就算是成年了，很快又要为儿女进学校操心，这个操心的时期，又得十五六年。老年人呢？家里总不会没有学生，还是得关心学校里头的东西。——且不必说千千万万终身在学校服务的男男女女，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一生跟学校的关系也就够密切了。

历史是发展的，文化是延续的。一页一页的历史，要由一代一代的人来创造；一代一代的人，又得从一所一所的学校里教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确实担负着对于历史和文化，也就是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巨大的责任。

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民族的学校也有悠久的历史。中国第一部通史司马迁的《史记》写道：“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庠序，也就是古代中国学校的称呼。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在雅典和亚历山大城跟学生对话的时候，孔墨荀孟等人在齐鲁等地也有“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的盛况。北宋初年建立在江南的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论起资格来，并不比牛津、剑桥、爱丁堡不列颠三大学逊色。

诚然，古时候的学校，不可能不带有“历史的局限”。但是，难道我们的祖宗就没有干过一点好事？难道他们留下的就只有债务而没有遗产？欧几里德给普多勒迈一世讲授的几何学，今天仍然可以作为教材。当这位威权赫赫的国王问欧几里德有没有办法把假设和求证搞得更容易一些时，欧几里德的回答是：“大王！通往几何学是并没有御道的。”而我们的孔子也实行

过“有教无类”的方针，他最器重的学生颜回在陋巷过着“一簞食、一瓢饮”的生活，也似乎不大像一个奴隶主，可见孔夫子办教育也是“并没有御道”的。

《过去的学校》的“过去”，并没有追溯到那么远，大体上是从清末维新变法、初设新式学堂的时候写起。而写这些“过去的学校”的老先生们，像蔡元培、沈尹默、刘仙洲、茅盾……也多是五四时代的人。他们或者是五四时代的校长、教师，或者是五四时代的学生。也有晚于五四时代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抗战时期的都有。下限则断在一九四九年，也就是建国以前。建国以后，那就只能说是“现在”，不能叫“过去”了。

这一段“过去”是刚刚成为过去的时光。它离我们还不很远，也就是一代人、两代人以前的事情吧。这是现代学校（讲授现代自然科学，用现代方法研究传统文化，同时注意到德育、体育和美育的学校）在中国草创的阶段；也是共产党得天下以前的阶段。除了解放区和地下党主办的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学院）外，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学校里还没有成为事实。正因为如此，因为是草创阶段，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些“过去的学校”当然不会是革命的，不能成为今天办学校的样板。但是，它们毕竟是父辈和祖辈们努力的成果，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先驱。看一看这些文章，看一看过去的校长是怎样当的，过去的教师是怎样教的，过去的学生们是怎样学的，他们有过哪些失败的教训，又有哪些可取的经验，这对于今天的校长、今天的教师、今天的学生，以及一切关心学校教育的人们，难道不是既有兴味又有益处的吗？

蔡元培先生逝世时，毛泽东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张伯苓先生逝世时，周恩来专程到天津张宅吊唁，叹息“先生死得太早了！”毛和周等共产党领导人，也曾经是这样看待创办“过去的学校”的前辈的。

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当然也就不会有将来。回忆过去，正是为了将来，为了现在。今年是一九八二年，距张伯苓先生逝世已经三十多年，距周恩来总理逝世也已经六年多了。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和教育，我们这些中年人、老年人和青年人都是有责任的。编辑这本《过去的学校》，也就是想来略尽一分责任。区区此意，读者鉴之。

钟叔河，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五日于长沙

目 录

《过去的大学》新序·····	钟叔河
原序·····	钟叔河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1
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	蒋梦麟	9
北京大学五十周年·····	胡 适	19
我和北大·····	沈尹默	22
回想北大当年·····	张申府	33
报考北大前后·····	茅 盾	39
我到北大任教·····	梁漱溟	45
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	罗家伦	48
北京大学杂忆·····	钱 穆	55
北大与北大入·····	朱海涛	67
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	梅贻琦等	90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	97
我在清华教体育·····	马约翰	117
忆清华·····	梁实秋	123
五四后的清华·····	冯友兰	132

刘仙洲与清华·····	黎诣远	138
张梅两校长印象记·····	柳无忌	146
我父张伯苓办南开·····	张锡祚	154
西南联大始末记·····	李钟湘	171
纪念西南联大六十周年·····	赵瑞蕨	192
北洋大学回忆片断·····	张含英	211
严格——北洋的学风·····	魏寿昆	217
回忆我在北洋大学·····	茅以升	221
罗家伦重建中大·····	王运来	226
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	赵瑞蕨	232
抗战期间的浙江大学·····	祝文白	242
复旦校长李登辉事迹述要·····	朱仲华等	247
中山大学工作三十九年见闻·····	周鼎培	261
陈嘉庚厦门办学·····	余钢等	270
暨南大学杂忆·····	蔡世英	276
圣约翰大学·····	林语堂	282
回忆金陵大学·····	陈裕光	286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拾穗·····	林砺儒	297
协和的创办·····	胡传揆	303
立信会计学校的创办和发展·····	潘序伦	314
无锡国专杂忆·····	杨廷福等	324
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	陶行知	331
早期的南开中学·····	黄钰生	336
我的中学生活·····	端木蕻良	349
关于艺芳女子中学·····	曾宝荪	353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括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学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人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



的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



蔡元培(1868-1940)

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

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上学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得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沈”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面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线，常常为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



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它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赠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殴毁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

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全文见《蔡子民先生言行录》下册三三七至三四一页)。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全文见《言行录》三四一至三四四页)。

那时候蒋梦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地困难一点。自民国九年起,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巽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质系;在化学系本有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而这时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衡青诸君;在生物学系本已有钟宪鬯君在东南、西南各省搜罗动植物标本,有李石曾君讲授学理,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造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切实用功;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诸君;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一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学教授兼预科主任,提高预科程度。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表的境界。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

蔡元培故居原址



1919年9月12日蔡元培重回北京大学



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

我是佩服章实斋先生的。那时候国史馆附设在北大，我定了一个计划，分征集、纂辑两股；纂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均从长编入手，并编历史辞典。聘屠敬山、张蔚西、薛闾仙、童亦韩、徐貽孙诸君分任征集编纂等务。后来政府忽又有国史馆独立一案，别行组织。于是张君所编的民国史，薛、童、徐诸君所编的辞典，均因篇幅无多，视同废纸；止有屠君在馆中仍编他的蒙兀儿史，躬自保存，没有散失。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法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操。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



的,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袁膺白诸君到场演讲。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我在几年的冬季,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状况,历一年回来。这期间的校长任务,是由总务长蒋君代理的。回国以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朗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于彭君此举,在公议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人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个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地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十五年,始回国。那时候,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消。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愧。

[附]中共中央于蔡元培先生逝世时发出的唁电

香港蔡子民先生家属礼鉴:得港电,惊悉蔡子民先生捐馆,曷胜哀悼!先生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勤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当此寇深国危之秋,正赖老成硕望宏济时艰,遽闻溘逝,无任痛惜!特派廖承志同志代表致唁外,特此电唁。尚祈节哀顺变,完成先生团结救国未竟之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三月九日

(原载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3月12日)